

胡适

在北大

桑逢康 著

有人说胡适给北大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

有人说胡适给北大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有人说他给北大添了光彩，有人说他使北大受损蒙羞。

有人说北大应该为胡适立碑，有人说北大不应该为胡适招魂。

啊啊！胡适与北大留下了太多的争论，太多的话题。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胡適 在北大

桑逢康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在北大/桑逢康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5039 - 3280 - 9

I. 胡... II. 桑... III. 胡适 (1891 ~ 1962) —生平事迹
IV.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9834 号

胡适在北大

著 者 桑逢康

策 划 喻 静

责任编辑 任肖兵

责任校对 张 莉

装帧设计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 whyscbs. 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 125

印 数 1 - 6 000 册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280 - 9/I · 1520

定 价 38.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言

胡适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教育领域里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的倡导者的作用，影响很大，因此之故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以后又担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

北大是胡适进行种种“实验”的基地。在现代知识界引领风骚的代表性人物中，以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最为深厚。

胡适在北大，是胡适政治和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胡适，撰写胡适传记的重要内容。胡适的许许多多的政见，以及哲学理念、文学主张、学术观点、教育思想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公之于世的，几乎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透过它们差不多就可以揭示胡适之全貌。本书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胡适在北大各方面的活动（包括政治的、学术的、教务的）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与评析，是一部以“胡适在北大”为主题进行重点探讨，以“胡适在北大”为主要内容兼及其他的专门著作。“在北大”而又不局限于北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胡适的学术传记也未尝不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综观对胡适的评价，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全盘否定，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并连带着对其学术和教育方面的业绩也一并抹煞；二是对胡适反共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立场轻描淡写或视而不见，过分赞誉其学术成就，甚至以胡（适）压鲁（迅）贬郭（沫若）。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胡适是海洋，其学识之渊博和涉猎范围之广令人赞叹。同样鲁迅和郭沫若也是海洋，他们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都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适、鲁迅、郭沫若堪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三足鼎立的“三巨头”，是三位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人物，整理和研究他们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大的文化工程。由于胡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冷落，因此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总的来看，胡适既是学者、教育家，又是社会与政治活动家。在政治上他的失误多于成功，有许多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确是应当予以批判和扬弃的；在学术上成就多多，谬误也不少，人们由于观点的不同而对之毁誉参半。胡适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在倡导“文学革命”和推行现代教育两个方面，人们对前者多有共识，对后者则有所忽视。实际上，虽然不一定把胡适赞誉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他的的确确是在努力着要把北大办好，对教育事业倾注了许多的心血。他的一些教育理念和主张至今仍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比如大学要朝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北大应注重于提高，国家要办好一批重点大学，以及要注意教育在门类与地区上的均衡发展等等。他在内乱不已、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提出要集中科学精英在北大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以满足未来国家发展与国防需要，更显示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与爱国苦心。

本书用历史的、科学的尺度，对胡适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正确就是正确，谬误就是谬误。在学术研究中，就同一事实、同一人物有不同的评说是很正常的，司空见惯的，本书对胡适的评说乃系作者一家之言，无意与时下“精英”们比长较短 PK 一番。

2

在写作手法上，本书采用学术与传记相结合，以史为经，夹叙夹议，注重评论并适当融入文学的元素，目的是既能显示出胡适思想的脉络轨迹，又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这种半是学术半是传记的写法，对作者本人来说属于实验性质，借用胡适的一句话曰：尝试。

本书又是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写成的，为展现历史和胡适思想的原态，故而引文较多。如一一注明出处（包括篇名、书名、作者、发表或出版的

时间与刊物等等),势必显得繁琐不说,而且会增加全书字数与出版成本,加重读者负担。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些东西又无甚需要,只是便于有“考据癖”的某些专家学者查检,然而他们应当是熟悉材料的,大可不必由我来提供线索。所以,为避免繁琐、降低图书成本起见,本书除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外,所引之文均不注明出处,仅对正文有所引申、发挥或需略作说明的地方,用注条形式列出。特此说明。

是为序。

桑逢康 2006年12月于北京

目录

序言 1

上编：胡适在北大——路线图

- 第一章 历史的渊源：胡适怎样进的北大？ 3
- 第二章 年轻的“海归”教授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11
- 第三章 他山之石：引进杜威实验主义哲学 20
- 第四章 问题与主义之争：向右转…… 32
- 第五章 由教授而治校：任北大教务长 41
- 第六章 “忍不住要谈政治” 55
- 第七章 中西文化，“全盘西化”？ 74
- 第八章 整理国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1
- 第九章 一次前期预演：出北大，长中公 107
- 第十章 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兴北大 122
- 第十一章 驻美大使 学者外交 144
- 第十二章 “过河卒子” “民主”怪圈 161
- 第十三章 出任北大校长：复兴北大 176
- 第十四章 一校之长与受辱女生 192
- 第十五章 1948：永别了，北大 213
- 第十六章 剪不断理还乱：未泯灭的北大情结 237

下编：胡适在北大——关系网

蔡元培	253
陈独秀	256
钱玄同	258
刘半农	261
傅斯年	264
蒋梦麟	266
李大钊	268
鲁 迅	270
周作人	274
陶孟和	277
高一涵	279
陈衡哲	283
梁漱溟	285
罗家伦	287
周炳琳	290
辜鸿铭	292
顾颉刚	295
俞平伯	298
钱 穆	300
毛子水	302
朱家骅	304
徐志摩	306
陈西滢	308
林语堂	311
梁实秋	314
饶毓泰	316

吴大猷 318

江泽涵 319

汤用彤 321

罗常培 323

魏建功 325

陶希圣 327

季羨林 331

邓广铭 333

千家驹 335

陈雪屏 337

郑天挺 339

主要参考书目 343

上编：胡适在北大

——路线图

「研究问题最能使读者渐渐的养成一种评判的态度，研究的兴趣，独立思想的习惯。」〔输入〕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餘价值」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我很诚挚的表示我的希望：

「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部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问不看作天经地义，而只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资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能在研究问题上多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第一章 历史的渊源：胡适怎样进的北大？

中国的近代教育始于清末“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为“新政”措施之一，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变通科举章程，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各省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七日又颁布学堂章程，分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养学堂，大致采用日本教育制式。

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办学方针，美国人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10科，学制为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学生预科毕业后授举人，正科毕业后授进士。由于“维新变法”运动旋即失败，在旧派封建顽固势力的干预下，仅有诗、书、易、礼及春、秋共六堂开办，性质与旧式书院无甚差别。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复校后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次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1910年扩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呈现中西混杂、新旧并存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后，帝制结束，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北大”既是“北京大学”的简称，也是人们对这所成立最早、贡献最大的中国最高学府的一种昵称，包含着许多的亲切与尊敬的意味在内。

在论述胡适与北大的历史渊源时，有两个人物必须首先提到：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陈独秀。

蔡元培（1863—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氏。清光绪新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受维新思潮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排满活动，曾先

后组织光复会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2年与章炳麟等创办中国教育会，主张用共和的教育造就理想的国民，进而建立理想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蔡元培被临时政府委任为教育总长。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被迫赴欧，在法国组织“华法教育会”，倡导并支持留法勤工俭学，使许多有为青年受益匪浅。1917年1月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陈果夫加上蔡元培，提出“弹劾共党案”，为蒋介石“清党反共”铺路。尽管如此，但后来蔡元培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深为不满的，1933年1月在上海与宋庆龄、鲁迅、杨铨等著名进步人士一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瑕不掩瑜，青史留芳，蔡元培逝世后周恩来对其一生言行作了高度评价：“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的杰出贡献主要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在1917年执长北大以后，他借鉴国外办学经验，大力贯彻新的近代教育理念，对中国这所最高学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整顿。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纳贤士与学有专长的人才，而不论其主张与信仰如何，也不看其为新派旧派。“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违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蔡元培的倡导与推动下，北京大学一扫昔日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沉闷与守旧，面貌焕然一新，各种学说、思潮、流派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相互竞争交融，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北大也因此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发祥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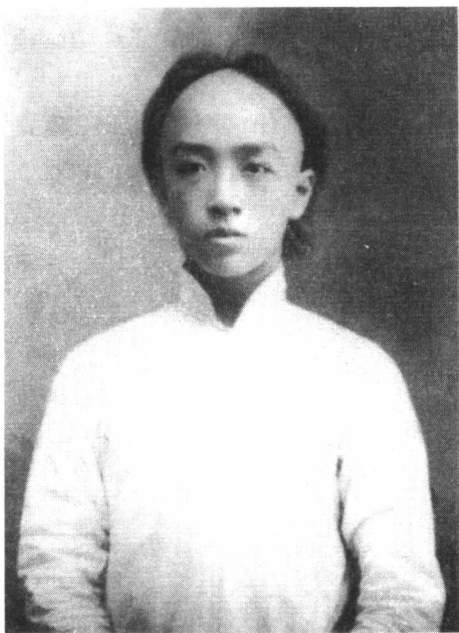
正是出于上述教育理念，尤其是改革文科的迫切需要，蔡元培根据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北大预科教授沈尹默的推荐，聘请了著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一职务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1880—1942），原名庆同、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氏。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并以日本为媒介，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思潮。1912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首次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1916年起在上海编辑《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方兴未艾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准备了坚实的基础。陈独秀本人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鉴别之后，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大革命时期他在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堕落为托陈取消派，则是后来的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鼓吹者，陈独秀自有他不应抹煞的历史贡献。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随之从上海迁至北京，箭杆胡同9号小院就是陈独秀当时寄寓的所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他协助校长蔡元培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就思想意识来讲陈独秀比蔡元培更为急进，态度也更为大胆。他身兼《新青年》杂志编辑人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两个阵地互相配合，左右开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传统文学的变革图新，于是陈独秀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人——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之。他之所以聘请胡适来北大任教，一来是出于同乡情谊，两人都是“皖中名士”，属于徽帮；二来是陈独秀对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颇为赏识，并引为志同道合者。后一条原因是主要的。



在上海求学时的胡适（1909年）

胡适（1891—1962），字希强（后改适之），安徽绩溪人氏。其父胡传25岁时进学为秀才，执教乡塾，后入仕途，曾任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知州，“能吏”而善文。其母冯顺弟，为胡传续弦之妻，终年操持家务，积劳成疾。胡适小时候在家读了9年私塾，刚满12岁时到了上海，进私立梅溪学堂（小学）。1906年夏入读上海中国公学，经同学介绍加入“竞业学会”，并间有旧体诗及白话文在《竞业旬报》上发表。

1900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被迫签约求和，赔款高达4亿5千万两白银，每一个中国人平均分摊一两。英美等国后来利用赔款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以及提供清政府向他们国家派遣留学生的费用。凡考取的中国学生均可享受“赔款官费”，此即所谓“庚款”留学的由来。但它并不是英美等国的恩赐，而是侵略者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钱。

胡适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先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后改修政治、经济。1915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门下专攻哲学。两年之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十年之后正式取得博士文凭。

胡适在美国留学共历时七年之久，这对他的哲学信仰、政治主张、学术观点与治学方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身为中国人思想却是典型的“美国版”，或者说是“美国制造”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在留美期间，胡适曾与赵元任、梅光迪、任鸿隽、朱经农等人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过热烈的讨论。通过相互辩驳、补正，胡适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八不主义”的文学观，即主张：

- （一）不用典。
- （二）不用陈套语。
- （三）不讲对仗。
- （四）不避俗。
- （五）须讲求文法。
-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 （七）不摹仿古人。
- （八）须言之有物。

这“八不主义”，胡适在日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述虽有所不同，前后顺序也有所变更，但总的原则和精神是一致的，他认为死文字不能产

生活文学，作诗也应和作文一样使用白话。^①“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愿共努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在近现代文学交替、转换之际，胡适率先提出了“诗国革命”的口号，从诗歌这一古典文学最占优势的领域打开突破口，这无疑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

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他们两人最初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他和胡适是绩溪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青年》尤其是《新青年》杂志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所以陈独秀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胡适遂于1916年2月寄了一篇译稿给陈独秀，从此两人便开始了信函往返，“纸上谈兵”。

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所以他最初是想“仰望”胡适“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这段话出自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心意思是要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匡正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其时胡适正和几个留美学生就“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讨论，他自己还尝试用白话写了一些新诗，众人对之褒贬不一。朱经农当时住在华盛顿，任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8月19日胡适在写给他的信中谈到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10月胡适又致信陈独秀，提出以此八项为“文学革命”的条件。陈独秀对此极表赞同，复函胡适云：

“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在陈独秀的殷切盼望与催促下，胡适随后不久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刊》，一份寄上海。陈独秀得之以后如获至宝，很快将胡适的文章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由此掀开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幕。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实验主义文学观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尽管它

^① 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写于1933年12月3日）一文中，谈及“文学革命的开始”时，将自己当年的主张概括为一句话：“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

存在着注重形式（语言）变革而对内容革新关注不够的缺点^①，但仍不失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陈独秀高度赞扬胡适的这一历史性贡献，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声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并在文章中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叙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胡文之不足。

胡适由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声名鹊起，一般人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往往陈（独秀）、胡（适）并列，称他们一个是“主帅”，一个是“急先锋”。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和胡适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因此，很合乎常理和逻辑地，自然而然地，陈独秀被蔡元培延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便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者胡颂平称，胡适生前曾偶然与他谈起：蔡元培看过胡适19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就有意聘请胡适来北大任教。但胡适的《留学日记》中并无此记载。蔡元培本人的说法当然最为可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先生说：“那时候因为《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

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可以说一拍即合。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披露了内中的详情：

“……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

^① 柳亚子在致杨杏佛信中说：“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见《留学日记》）。又说：“‘文字形式’是往往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见《逼上梁山》）。《文学改良刍议》所言八事，针对旧的形式已经束缚了内容（思想意识情感等等）的表达，故从形式（或曰工具）方面着眼较多，而对内容的重要性强调不够，更缺少阐述。不过也不能据此断定胡适只注重形式，完全忽略了内容。